

人工智能在消除脑、体劳动差别中的角色、作用及方法论启示

王珂

摘要: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方兴未艾。在可预见的未来发展中,人工智能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特殊产物,本质上依然属于生产工具的范畴。人工智能在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过程中,能够通过“对脑、体劳动的同步代替,促进新劳动形态的形成,但也有产生“无用阶级”的风险。因此,要贯彻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把握好人工智能发展的正确方向以及人工智能代替人类劳动的节奏和速度。对人工智能的技术范式要进行全面审思,以人的主体性矫正人工智能的“任性”,积极引导其发展向善,在消除脑、体劳动差别的实践中彰显技术正义,形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关键词:人工智能;脑力劳动;体力劳动;新劳动形态;以人为本

中图分类号: F01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4)10-0115-07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和管理机制”^[1]。随着“智能驾驶”“无人工厂”等技术日益成熟,并在生产生活中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与推广,当前人工智能技术与人类社会生产劳动呈现出加速嵌合的态势。这不仅带来了社会生产形式以及组织管理方式等方面的深刻变化,还直接影响了社会劳动分工和劳动形态的发展进程。在此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是否仍然具有科学性?人工智能在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对立和差别的过程中又将承担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从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的基本立场出发,积极探寻这些问题,对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以及继续推进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视域下的人工智能发展

劳动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核心概念

之一,贯穿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多个领域,具有深远影响。其内涵十分丰富,包括劳动本质论、价值论以及异化劳动理论等。其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将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对立和差别的科学论断,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正确方向,同时也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实践发展。这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在人工智能时代仍然具有科学性和生命力,需要在社会主义实践中进一步坚持和发展。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描绘了未来社会的理想状态:“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2]435-436列宁也认为在“消灭阶级”这一社会主义最终目的实现过程中,既要推翻剥削者,同时也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3]。虽然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发展显然已经超出了当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

收稿日期:2024-07-24

基金项目: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青年项目“智能科技革命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研究”(2024QN036)。

作者简介:王珂,男,法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讲师(北京 100091)。

认知范围,但并不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先进性。“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一个半多世纪之前,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它是科学的理论,迄今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4]从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出发审视人工智能在消除脑、体劳动差别中的角色与作用,既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的内在要求,也是在智能科技革命时代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的关键举措,具有重要意义。

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逐步重塑人们的劳动方式、劳动形态以及劳动内容,同样也深刻影响着人类脑、体劳动之间的差别和对立关系。根据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人类脑、体劳动的差别和对立会随着社会发展进步而趋于消失。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根据当时工业革命的发展现状,基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对人类社会发展趋势所做出的科学论断。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人工智能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产物,代表着当前智能科技革命时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先进水平。“人工智能”这一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956年的达特茅斯会议。会议上,约翰·麦卡锡、马文·闵斯基、克劳德·香农等学者共同讨论了机器模拟智能的一系列问题,并为讨论内容起了一个名字:人工智能。近年来,随着诸如 ChatGPT、Sora 等能够利用复杂的算法、模型和规则从大规模数据集中学习,从而创造新的原创内容的生成式人工智能(GAI)的日益发展成熟,人工智能开始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成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人工智能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因此,在人工智能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重新考量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在实践中探究消除人类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差别和对立的具体路径十分必要。

关于人工智能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这一相关问题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考察人工智能对劳动解放和劳动分工以及劳动价值论等方面的影响上。一是人工智能可以为人类劳动解放的最终实现提供条件。有学者认为基于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从劳动本体论、劳动价值论和劳动幸福论三个维度出发,人工智能将有利于人的劳动解放、人的劳动尊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5]。而关于人工智能时代是否会带来劳动解放,或者说带来何种意义上的劳动解放,需要我们再次回到马克思的“一般智力”范畴,对人工智能之于劳动解放的意义予以多重维度的思考^[6]。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还应从政府、技

术、劳动者等层面,建构一个包括所有利益相关者在内的人机和谐、人机协同的生态系统^[7]。二是对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价值论科学性的论证。人工智能时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并没有过时,劳动者的活劳动依然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劳动者在生产劳动中仍占有主体地位,应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8]。三是人工智能将改变人类社会的劳动分工和劳动方式,关系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马克思的对象化劳动理论出发,在使用大模型的人机交互中,劳动方式发生颠覆性变化,人类将走向新的自由和解放^[9]。当前,通用人工智能将各种劳动技能转化为智能工具,形成了劳动方式更加灵活的软分工体系,推动着人类劳动的自由化,直接关系到未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能否实现^[10]。此外,还有学者关注到了人工智能对异化劳动的消解及其限度^[11],以及对劳动者群体生存和发展的影响^[12]。

本文尝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中关于“消除脑、体劳动差别”的理论为切入点,来审视人工智能的本质以及其在消除脑、体劳动差别中的角色及作用,以期能够获得相关方法论启示。

二、人工智能的定位:“无自我意识”的劳动生产工具

人工智能的先进性和引领性,使其在当前科学技术发展中处于核心主导地位。习近平也多次在讲话中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正在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等方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3]。目前国内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对人工智能的定义基本是围绕“一种计算机系统(程序)”展开。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发展中,人工智能作为生产工具的本质都不会被改变,在消除脑、体劳动差别的进程中,人工智能的定位将仍然停留在工具层面,扮演着劳动工具或者生产工具的角色。

第一,从人工智能自身的形成逻辑来看,人工智能是人类劳动的特殊产物,其本身并不具备“自我意识”,自我意识的缺失使得人工智能只能被归入“劳动工具”的范畴。正如马克思所言:“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对象化的知识力

量。”^{[14]102}所以,人工智能不过是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根据社会发展需要,通过特定的技术手段,由人类的劳动所创造出的新的“机器”、“人脑的器官”,是人的身体机能为适应社会发展在自然界的延续。有学者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出发,将人工智能界定为人脑的“智能化物”和“外化形式”,并进一步指出“人工智能只是人脑的外化形式以及智能化物,它最终是无法离开人脑而独立存在的”^[15]。还有学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揭示的资本生存逻辑,指出人工智能的工具本质:“就实质而言……人工智能实际上是资本谋取剩余价值进而维持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存活的技术工具。”^[16]虽然与过去人类创造的各类劳动工具相比,人工智能有自身的特殊性,但目前人工智能并不具备完全独立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在其创造和运用过程中仍然要直接或间接依附于人类的活动。因此,“无法解决的自我意识问题让人工智能仅能作为一种工具存在”^[17]。

第二,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逻辑来看,人工智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虽然在对人类脑力劳动代替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劳动生产工具。人工智能的出现既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进步的表现,同时也加速了人类社会发展变革的历史进程。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劳动的形式和状态将会随着社会发展的形式和新的劳动工具的出现而发生改变。“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果。”^{[18]443}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和其在社会生产领域中的广泛应用,人类可以进一步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直接从科学中得出的对力学规律和化学规律的分解和应用,使机器能够完成以前工人完成的同样的劳动”^{[14]99}。从近现代以来的发展可以看出,人类历史上的蒸汽革命、电力革命都极大地促进了体力劳动的解放进程,脑、体劳动之间的差异也开始呈现出消弭趋势。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虽然人工智能的出现和其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与过去蒸汽机或内燃机对人类体力劳动的代替与解放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同,但作为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工智能在本质上仍是一种劳动生产工具。即使未来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成熟,人类社会能够在人工智能等新科技的赋能下最终步入一个崭新的“人机协作时代”,“但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机器都只是人类

的工具”^[19]。

明确人工智能在消除人类脑、体劳动差别中的地位和角色之后,需要进一步认识劳动生产工具的重要性,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18]210}在此基础上,可以认为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劳动生产工具不仅仅具有“测量器”和“指示器”的作用,而且能够在促进人类劳动解放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能动作用。下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详细探讨。

三、人工智能的“双重作用”:新劳动形态的生成与“无用阶级”的出现

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能够对人类社会生产中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产生同步、双重的影响。卡尔·波兰尼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双向运动”理论(也译为“双重运动”或“双重发展”,笔者认为“双重运动”更符合语境)^①。引入“双重运动”的理论框架,有助于我们理解人工智能在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差别时所起到的“双重作用”。在人工智能的“双重作用”下,既有可能促进新的劳动形态的生成,也有可能产生“无用阶级”的出现。

第一,人工智能的“双重作用”能够实现对人类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同步解放,在实践中促进传统脑、体劳动之间的进一步融合,从而为新劳动形态的生成创造条件。由于人工智能自身的特殊性,它能够代替人类部分脑力劳动。“以往的机器只替换体力劳动,智能机器则不仅替换体力劳动,更替换脑力劳动。”^[20]在过去机器对人类体力劳动的“单向度”代替中,体力劳动能够不断得到解放,从而使得人类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呈现出一种显著的消弭趋势。然而,人工智能机器的“双重”代替则使这种明确的趋势变得模糊起来。而且从人工智能作用的具体向度来看,其对人类脑力劳动的代替与对体力劳动的解放是同步进行的^[21]。虽然从人类劳动的分类来看,现阶段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的代替主要集中在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以及重复性的脑力劳动上。但人工智能在其中的广泛运用,使得人类劳动的方式和效率都发生了重大改观。“与科学发展的一体化相适应,人工智能的发展使社会发

展出现‘逆分工’现象,劳动……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从分工走向融合的现象。”^[22]因而人工智能的“双重作用”还表现为在代替大量简单的体力劳动和重复性的脑力劳动的同时,能够为融合了体力和脑力的新劳动形态的产生创造条件。在这种新劳动形态中:一方面,智能机器和人类劳动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深度介入人类劳动,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实践中都发挥重要作用。“在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不再单纯地指人的劳动,而是指人与智能机器人的劳动;劳动力也不再单纯地指人的劳动能力,而是指人的劳动能力与智能机器人的劳动能力的综合统一。”^[23]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将得到极大提高。随着智能机器应用在社会生产中的普及,人类社会将进入前文所提到的“人机协作时代”,社会生产效率将得到极大提高。这也意味着未来社会发展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能够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为社会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创造前提。

第二,人工智能的“双重作用”使得其在加速社会转型与变革的同时,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风险与挑战。随着人类劳动的进一步解放以及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传统劳动存在的社会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大量劳动者将面临失业或被迫转型。那么,在人工智能这一“双重作用”的可能后果中,是否需要关注和应对产生“无用阶级”的风险?“无用阶级”这一概念来自尤瓦尔·赫拉利教授的《未来简史》一书——“一个全新而庞大的阶级:这一群人没有任何经济、政治或艺术价值,对社会的繁荣、力量和荣耀也没有任何贡献”^[24]。虽然赫拉利教授将“无用阶级”定义为无产阶级和大量失业者的这一错误观点已经受到了国内学者们的有力批判,但“无用阶级”这一概念的提出无疑是对未来人类全面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后可能出现的情况的一个预警。在《大转型》中,波兰尼认为自由市场扩张和社会保护这一“双向(重)运动”的直接后果就是引发了政治冲突^[25]。反观人工智能在消除脑、体劳动差异中的“双重作用”,无论是对重复性体力劳动和程序性脑力劳动的代替,还是推动新的劳动形态的生成,都是对传统职业和劳动分工的一次巨大变革,由此所产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必然也会影响到社会发展的稳定。因此,一方面,人工智能既有可能成为未来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差别和对立的“助推器”;另一方面,也会导致大量工作岗位和职业消失,进而有引发社会大规模失业的危险。在一定程度上,由人工智能所衍生的新兴产业创造出来的新的劳动

岗位可能会解决部分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例如,百度公司旗下的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平台“萝卜快跑”,目前正在武汉投放运营无人驾驶出租车。虽然这一新业态不再需要司机了,但仍然需要人力来负责无人驾驶后台安全监测和紧急接管工作,“云舱安全员”这一职业便应运而生,这也能解决一部分相关人员的再就业问题。但这只是个例,短期内必然会有相当数量的劳动人口由于自身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的不足,或是社会物质产品的相对充足等主观和客观原因,在生活和工作中都无法融入新的智能时代,从而只能处于一种“生活失重”“就业失重”的窘态^[26]。虽然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无用阶级”的产生完全是资本视角下的产物,“所谓‘有用’‘无用’之分也完全是针对能否给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而言的”^[27]。但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所带来的一系列潜在风险,尤其是对当前社会发展稳定可能会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还是要予以重视。相比于赫拉利教授从旁观者的视角对可能产生“无用阶级”的这一“远虑”(假想问题),我们更应该先将关注的重点放到如何解决人工智能发展将带来的一系列“近忧”(现实问题)上。

四、以人为本化解人工智能发展中的“近忧”

如前所述,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劳动生产工具应该有助于消除脑、体劳动之间的差别,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不是相反。按照传统的定义,人工智能是一把“双刃剑”,如何运用和推动人工智能的技术进步是广大科研工作者的任务。就像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创造出来用于规定机器人在其小说中的行为规范的“机器人三大定律”,当前也已经针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制定了“阿西洛马原则”^②。至于如何更好地趋利避害,则还是需要对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些终极价值做出具有“先验性”的规定和“提醒”,设立能够起到引导作用的边界和规则。

因此,从人工智能在消除脑、体劳动间差别中的“工具地位”和“双重作用”出发,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提醒”需要充分强调在其发展过程中贯彻以人为本这一价值理念的重要性。“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这一根本利益是人工智能进化的底线和红线……必须确保人工智能为人类服务的根本目标。”^[28]在规范人工智能发展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民

生发展,有效满足人的自身发展需求以及平衡社会利益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从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出发,认清人类脑、体劳动差异的本质,确保人工智能发展的正确方向。民生问题是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环节。习近平在谈到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问题时指出,要加强人工智能同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结合,从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需要出发,推动人工智能在人们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的深度运用,创造更加智能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29]。人工智能时代,满足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仍然是在实践中保障民生的重要任务。在这一过程中,脑、体劳动间的差异化和对立性从本质上来看还是由人与人之间、劳动者社会分工之间的差异和对立造成的。虽然人工智能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一差异和对立,而且即使是在未来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中,社会劳动者之间差异化需求同时得到有效满足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也会因过于理想化而难以完全实现,但这绝不意味着就应该放弃朝着这一方向发展的努力。有学者曾将人工智能比喻为强大的“塞维坦”,认为“驯服”人工智能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要引导其向着“善智”的方向发展,为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提供物质保障。“人工智能发展的目的应该是提高人类社会的生产力,从而为公平正义提供更好的物质基础。”^[30]此外,还可以通过征收“人工智能税”等二次分配的宏观调控手段,控制好人工智能“进场”的规模和领域,从国家发展战略的层面上合理规划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走向;制定和完善人工智能的政策法规,明确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应用范围及监管措施,为人工智能的正确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从保障民生和满足人民自身的基本生存和发展需求出发,在贯彻以人为本理念的前提下,无论是“善智”发展的引导,还是国家(政府)层面通过宏观调控、人工智能立法等政策法规手段的干预,都将能够对社会分工中的差异和对立起到积极有效的缓和作用,进而确保人工智能的正确发展方向。

第二,正确处理好社会利益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在具体发展过程中要保障社会的整体福祉和公共利益,把握好人工智能代替人类劳动的节奏和速度。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往往是遵循一种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线性发展节奏,但人工智能的发展演进(确切来说是“技术迭代”)却是呈指数级

增长。如果在人工智能的具体发展过程中不加以人为的主动干预和控制,那么在“线性”和“指数”两种发展模式 and 速度之间必然会出现巨大的鸿沟与落差,使得社会陷入“撕裂”和动荡的危险状态之中。因此,虽然人工智能新技术的发展能够对脑、体劳动间差别的消除起到重要的助推作用,而且随着未来强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以及人工智能应用范围的进一步扩大,这种推动作用也将会呈现出一种加速度的趋势。但消除两者间差别和对立的速度绝对不是越快越好,而是必须具有一定的规划性,要能够与社会发展的整体协调性保持一致。人工智能的发展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在代替人类劳动的过程中不能仅仅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是要能够兼顾社会环境的稳定、社会秩序的维护以及社会福利的提升等,进而有效化解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发展张力。“把握人工智能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高度融合的特征。既要加大人工智能研发和应用力度,最大程度发挥人工智能潜力;又要预判人工智能的挑战,协调产业政策、创新政策与社会政策,实现激励发展与合理规制的协调,最大限度防范风险。”^[31]例如,在电子支付和自动驾驶技术都日益成熟的当下,北京等一些现代化大都市,大部分公交车除了驾驶员外,依然配有售票员、安全员各一名,此举显然是出于人文关怀和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的需要,而非纯粹对经济效益的考虑。

五、方法论启示

人工智能在消除脑、体劳动差别中的历史性在场与技术化运作愈发显示出创新性力量,同时也在不断挑战人的主体地位,如部分地代替人选择、判断、思考和行动等,从而引发各类社会问题。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应该对人工智能的技术范式进行全面审思,以人的主体性矫正人工智能的“任性”,积极引导其向善发展,在消除脑、体劳动差别的实践中彰显技术正义,形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第一,在消除脑、体劳动差别过程中规范人工智能的技术范式,以人的主体性矫正人工智能的“任性”。从劳动的发生和进行来看,人的参与和在场是人工智能系统得以正常运作的必要前提,需要进一步强化对人的主体性的认识和理解。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强调,关于“对象、现实、感性”,要从“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去理解,要“从主体方面去理解”^[32]。芒福德在《技术与文

明》中也指出:“机器本身不提出任何要求,也不保证做到什么。提出要求和保证做到什么,这是人类的精神任务。”^[33]因此,剖析人工智能消除脑、体劳动差别的关键是明晰人的主体性在劳动过程中何以逻辑上先于人工智能。人的感性思维和心理机制既可以在劳动过程中建构起灵感、情感、形象思维等非形式化思维,又可以在感性世界中建构出理性思维;而人工智能的思维发展顺序却是相反的:人工智能被人类赋予了理性逻辑(算法、计算逻辑),只能在人的主体干预下建立起对事物的感性认识。因此,作为人类社会的技术范畴(前文中提到的“无自我意识”的劳动生产工具),人工智能目前在消除脑、体劳动差别中仍从属于人的主体性技术。以人的主体性矫正人工智能的“任性”,尽可能规避和化解其所带来的风险挑战,引导人工智能技术服务于人类,清除人工智能拜物教的迷思,从而在促进新劳动形态生成的过程中营造人机和谐共生、良性互动的生态系统,加快智能社会建设步伐。

第二,积极引导人工智能向善发展,在消除脑、体劳动差别中彰显人工智能的技术正义。习近平指出:“要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科技创新的落脚点,把惠民、利民、富民、改善民生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34]人工智能作为新科技革命的核心与前沿领域,对未来社会形态演进的革命性作用不言而喻,要确保这一先进智能技术的人民底色,在其发展和应用中始终做到以人民为中心。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工智能的应用由于遵循资本的逐利意志,最终会使得技术走向人的对立面,背离正确的发展方向。但在我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能够引导人工智能产业向善发展,能够从根本上避免所谓“技术超人”“信息寡头”的形成,从而为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广阔空间和光明前景。在这一前提下,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才能既有量的增加又有质的提升,有效带动社会发展进步与经济稳定增长,为消除脑、体劳动间的差别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不是成为产生“无用阶级”的导火索。简言之,人工智能的发展不应颠倒人的主体性与技术的客体性之间的关系,不能独立于生产关系的框架而独立发展,而是要准确区分人工智能在不同社会制度形态中的应用效应。应将人工智能的发展置于社会主义的应用与共产主义的展望之中,确保这一先进智能技术的人民底色。因此,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区分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和社会主义应用的关键标准之一,同时也是其在消除

脑、体劳动差别中技术正义的彰显。

第三,以消除脑、体劳动差别为契机,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与应用中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工智能的出现是由现实物质生产关系和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仍属于人类社会生产领域的实践样态。正如马克思并非抽象地讨论商品交换价值一样,抽象地区分脑、体劳动间的差异及其不同作用也并非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的关键。人工智能消除脑、体劳动差别的目的是要服务于提高人类自身生产效率使自身机能得到解放,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虽然人类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全部过程,也即观念改造过程和事实改造过程,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下能够突破人脑和人手等人体器官的天然局限,并且可以最大限度摆脱自然环境的束缚,实现所谓的智能化与自动化,但人工智能时代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仍然要通过人的劳动实践形态来实现和完成,而且需要在超越传统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实践的基础上融合一系列智能科技因素和劳动生产资料。马克思指出:“广义地说,除了那些把劳动的作用传达到劳动对象、因而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充当活动的传导体的物以外,劳动过程的进行所需要的一切物质条件也都算作劳动过程的资料。”^{[18]211}在人工智能的技术实践中,数据的生产和应用以及智能算法的运行同样是劳动过程中的重要生产资料,能够通过对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代替,进一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为人类创造大量的自由劳动时间提供可能。因此,只有正确认识到人工智能技术实践的最终目的,才能有效地达成马克思所描述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理想劳动状态——“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2]435},从而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劳动和全面发展,使人工智能成为进入更高级社会形态的催化剂。

注释

①Double Movement(双向运动):自我调节的市场触发了社会保护的反向运动,由此形成了自由市场与社会保护之间的双向运动。参见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版,第66页。关于波兰尼的这一著作,目前国内还有一个译本,其中将Double Movement译为“双重发展”。参见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版,第132页。②2017年在美国加州阿西洛马召开的“有益的人工智能”会议上,来自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的数百位专家学者联合签署了阿西洛马人工智能23条原则。但是对于人工智能的未来风险,该原则中的第21和22条主张自我修复。参见Future of Life Institute, Asilomar AI Principles. <https://futureoflife.org/ai-principles>.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34.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1.
- [4]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8.
- [5] 薛峰,何云峰.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视域下人工智能诠释的三个维度[J].重庆社会科学,2019(9):61-69.
- [6] 宋建丽.人工智能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劳动解放的三重悖论[J].理论探讨,2024(2):126-132.
- [7] 祝黄河,孙兴.人工智能时代劳动发展的逻辑与实践[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3(4):56-64.
- [8] 李楠.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价值论再审视[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4(3):39-46.
- [9] 肖峰.基于马克思对象化劳动理论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探究[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4):73-85.
- [10] 齐志远,高剑平,郝亚楠.生产工具演变与劳动分工体系变革:从机器、专用人工智能到通用人工智能雏形 ChatGPT[J].自然辩证法通讯,2024(2):1-10.
- [11] 李扬.人工智能对异化劳动的消解及其限度[J].江汉论坛,2022(8):34-38.
- [12] 张咏雪.从自动化技术到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者影响的技能异质性研究[J].社会学研究,2024(4):69-91.
- [1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119.
-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15] 欧阳英.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看人工智能的意义[J].世界哲学,2019(2):5-12.
- [16] 蒋红群.无产阶级会沦为无用阶级吗?[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7):128-136.
- [17] 陈凡,程海东.人工智能的马克思主义审视[J].思想理论教育,2017(11):17-22.
-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9] 李开复,王咏刚.人工智能[M].北京:文化发展出版社,2017:161.
- [20] 朱建田.人工智能时代的“机器换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审度[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167-171.
- [21] 王珂,陈鹏.向度与限度:人工智能在消除脑、体劳动差别中的作用论析[J].经济学家,2021(9):13-20.
- [22] 王天恩.人类解放的人工智能发展前景[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4):180-187.
- [23] 欧阳英.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看人工智能的意义[J].世界哲学,2019(2):5-12.
- [24] 赫拉利.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M].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301.
- [25] 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111.
- [26] 高奇琦.就业失重和社会撕裂:西方人工智能发展的超人文化及其批判[J].社会科学研究,2019(2):64-73.
- [27] 肖峰.《资本论》的机器观对理解人工智能应用的多重启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6):48-57.
- [28] 庞金友.人工智能与未来政治的可能样态[J].探索,2020(6):84-96.
- [29] 习近平.加强领导做好规划明确任务夯实基础 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N].人民日报,2018-11-01(1).
- [30] 高奇琦.人工智能:驯服塞维坦[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284.
- [31]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0.
- [3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99.
- [33] 芒福德.技术与文明[M].陈允明,王克仁,李华山,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9.
- [34] 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 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29(1).

The Role, Function, and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liminat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rain and Body Labor

Wang Ke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new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represent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in the ascent.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a special produ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essentially still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production tools. In the process of eliminat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ental labor and physical lab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n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new labor forms through the synchronous replacement of brain and body labor, but it may also create the risk of “useless clas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implement the people-oriented development concept, grasp the correct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rhythm and speed of its replacement of human labor. While adhering to and developing Marxist labor theory, it actively guides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be good” and provides a material basis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elimination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rain and body labor.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ental work; physical labor; new labor form; people-oriented

责任编辑:思 齐 弈 寒